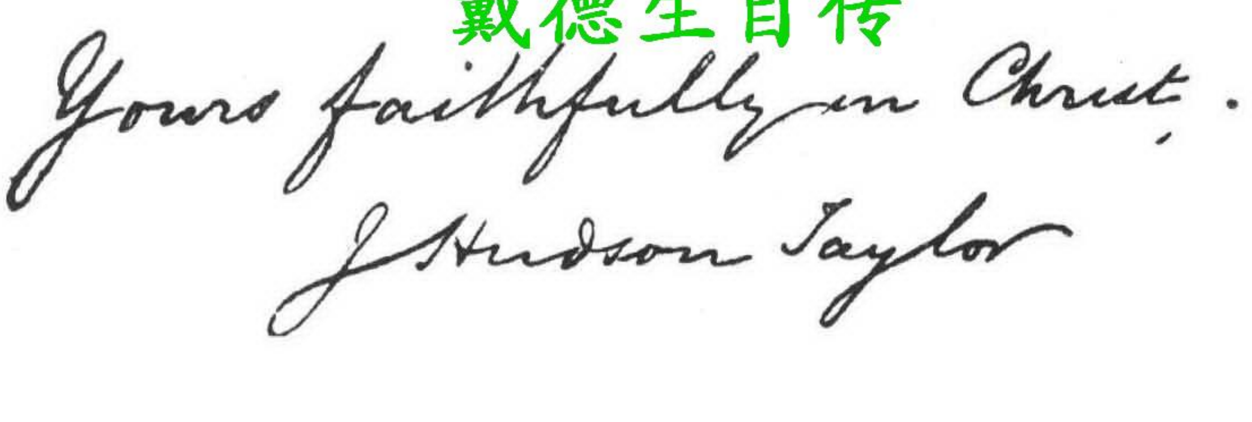
献身中华

戴德生自传



献身中华

戴德生自传

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
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不，不，不是中国，是基督

戴德生一个平凡的英国人，因为爱神的缘故，愿意顺服和响应神对他的呼召，为着他的异象——中国，愿意摆上他的一生，以致他的生命变得不平凡，变得传奇。戴德生在华五十一年。他创立的差会（传道会）差派了超过八百名传教士及建立了一百二十五间学校，并在中国带领一万八千人归信基督教，在十八省成立了三百多所由五百多位本地助理参与的传教站（stations of work）。

戴德生以他对中国文化的敏锐，对传教的热忱而闻名。他也在很少传教士穿唐装时代已穿中国服装。在他领导下，内地会成为一个突出的非宗派差会，从所有基督教团体和劳工阶层、单身女性、不同国籍的个人吸纳成员。由于内地会的反鸦片贸易运动，戴德生被西方视为十九世纪以来最瞩目的来华欧洲人。

本书又名《戴德生回忆录》（**A Retrospect** by Taylor, James Hudson ）

自使徒保罗以后，能够心怀“广大异象，而按部就班”，将福音差传如此广袤疆域的人，十九世纪来，首推戴德生为第一人。

——历史学者禢嘉路得（Ruth Tucker）

序 言

葛培理

再没有谁能像戴德生一样，愿意为神的缘故，完全献身给中国。他甘心冲破传统，换上中国的服装，更积极超越宗派界限，一心要把福音传到新的疆土里。戴德生之所以义无反顾，献身与主，绝非出于一时冲动，或是自我表现，而是他深切关怀到一群尚未认识救主耶稣的人。他一生勇往直前，是由于他愈来愈确信神的信实。

戴德生对神的信心，正是今天千万中国信徒的写照。他们矢志不渝，正好见证神是多么信实。今时今日，大家都极之关心中国的状况。本书的出版，实在是合时不过了。今天很多教会视自由为理所当然的；然而中国信徒却在诸多限制和剥削下，依然坚忍不屈，满有平安，怎能教我们不羞愧哩！其实，他们只存一个单纯的信念：“有一位永活的主，他借着道向我们说话，他所说的，必定成就，也不会背乎他所应许的。”

本书对于简朴生活、理性的顺服、信心的祷告，以及恒久忍耐，都做出深刻的描写，叫我们不得不反省自己，究竟怎样才是基督里的人。此书的出版，实在令人兴奋。盼望神使用这本书，透过它鼓励我们，并彰显他的荣耀。

祷告的能力

许多年前，大概是 1830 年吧！那时候父亲是家乡一名热心而又成功的传道人。他读了一些关于中国的书，特别是贺尔船长的游记，内心深处不由得为中国的属灵光景深感难过。但当时的处境，却容不下他亲赴中国传道的念头。在祷告中，他对神许下宏愿，如果神赐他一名儿子，他愿意把儿子献上，接受神的呼召，在这片广大而穷困的国土事奉祂。那时候的中国，可说是完全自闭于真理的门外。我对父亲的心愿，或是当时他所作的祷告，却是一无所知；直至我在中国工作了七年多，回国之后，才获悉此事。当我知道父亲的祷告，竟然在我身上蒙神垂听，那时的心情煞是一片欣喜。

少年的我，认识了一些朋友，他们对信仰抱着怀疑和鄙视的态度，而我也随波逐流，接受了他们的观点。然而我挚爱的母亲和妹妹却为我祷告，求主叫我得以悔改重生。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天，当时我大约十五岁。由于母亲不在家，我有一天的假期；午间百无聊赖，为了打发时间，我便跑到父亲的书房找一些书来看，但遍寻之下可没有找着甚么中看的。于是我翻开小篮，在篮里的小册子中拣了一份看来颇具兴味的福音小册。我坐了下来，毫不在意的翻阅着。 那时候，在七、八十哩外的母亲，正吃完了午餐站起来，心中为她儿子得救的事十分迫切。

她想今天难得时间比较充裕，可以藉此机会为她儿子向神祈求。于是她进了房间，把门锁上，定意除非神答允她的祷告，否则便不踏出门外。一个小时复一个小时，慈爱的母亲为我向神哀祷；到了最后，不能再祈求下去，而觉得非感谢神不可，因为圣灵告诉她，她所求的已蒙应允—— 她的儿子已得蒙救赎。

这时，我正翻阅着那份小册，有一个句子冲着我来：“基督作成的工。”立时间“作成”两字萦绕我的心间。自忖：“基督既已作成了完全的救赎，把罪债抵偿，那还有甚么该作的呢？”圣灵的光照透我的心灵，给我带来重生的喜乐——在世界上，我再没有甚么可作的，只有跪下来，接受这位救主和祂的救恩，不住的赞美祂。

数日之后，我首先要求妹妹保证不告诉任何人，然后才把我心灵得着喜乐的秘密告诉她。两个星期以后，母亲回来了，我率先到门外迎接她，告诉她我有个好消息急着要与她分享。母亲立即把双臂绕着我的颈，把我紧抱入怀，说：“我儿，我知道了。我为你的好消息，已经快乐了整整两个星期。”“为甚么？”我讶然问道：“难道妹妹不守诺言？她答应过不告诉任何人的。”母亲向我保证这好消息不是从人听来的，然后把上述的经过向我解说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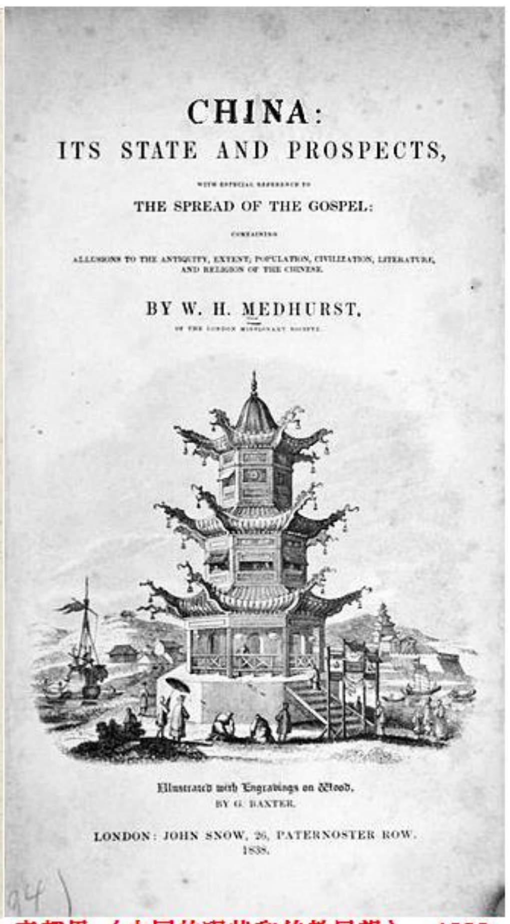
不久之后，我捡起一本日记本，以为是自己的，因为从外表看来，那简直是一模一样。我把它翻开，映入眼帘的，原来是妹妹的日记，记述她立意每天为我的得救向神祈求，直至神应允她的祷告。计算起来，这个十三岁的女孩为我祷告了整整一个月，神才使我离暗就光。自从我开始做一个基督徒，就这样体会到祷告的能力。

事奉的呼召

在我得救后数月，一个悠闲的下午，我把自己关在房里，用了好一段时间与神相交，我恳求祂给我一点工作，好表达我对祂的爱和感激。当我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在坛上，那浸溢我灵魂的庄严感觉，给我一个明显的确据，就是神已接纳我的献祭。神的同在有说不出的真切。那时我还未满十六岁，我记得我俯卧地上，伸开四肢，静静地俯伏在神的面前，心中有一股不可言喻的敬畏和喜乐。

在我定意献身事主后数月，有一异象深深印入我的心灵，这就是神要在中国用我。这工作看来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要付上我的生命，因为当时的中国并不开放，罕有宣教士在中国工作，而有关在中国宣教的书籍亦不多见。但我知道在本市一位传道人手上，有一本麦都思(Medhurst)所著的《中国——它的现状和展望》，便登门造访，借书一读。他欣然答应，并问我为甚么要读这本书；我告诉他神要在那地方用我一生。“你打算怎样去？”他问道。我回答说我一点也不知道，似乎只好跟十二使徒和七十个门徒在犹太地的作法一样，腰袋不带金钱，行路不带口袋，只靠我的主供给我一切的需要。牧师慈爱地把手放我的肩膀上说：“啊！年青人，等到你年纪较大的时候，你便会比现在聪明一点，这种想法，基督在世的时候可以行得通，现在却不行了。”

麦都思教士与中国信徒在一起



麦都思:《中国的现状和传教展望》，18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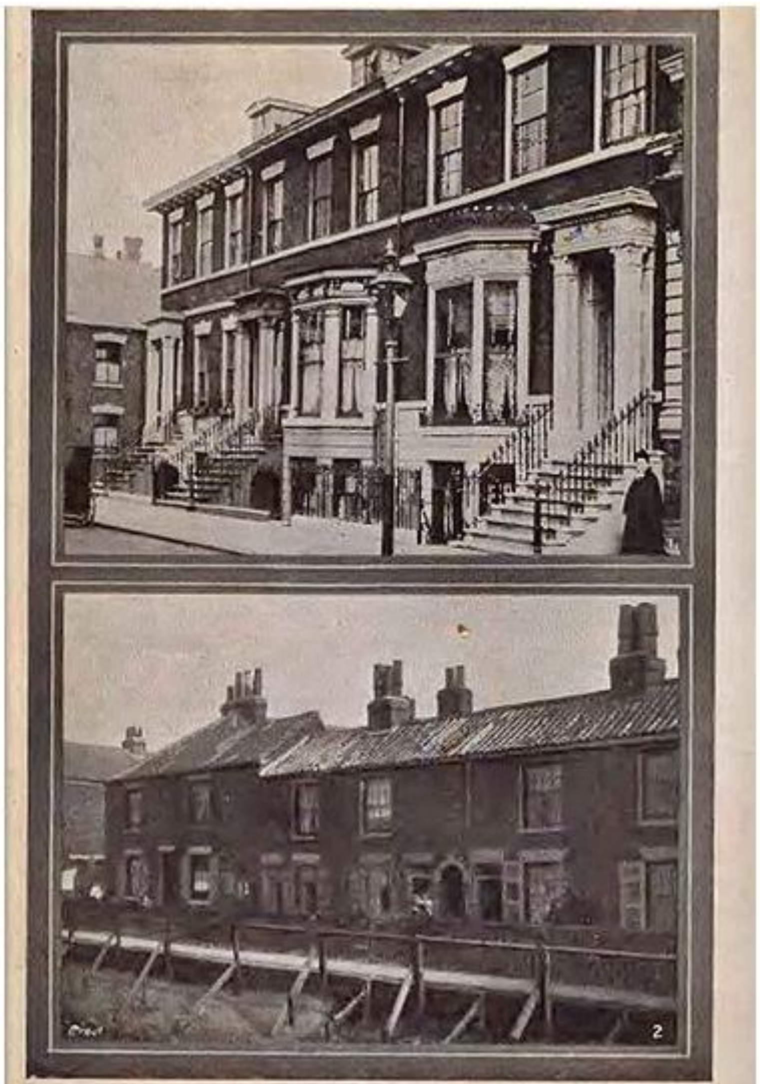
我现在可大得多了，但不见得比那时更聪慧。我愈来愈深信，我们若照着主给门徒的指示和保证去做，在今日的世上一样是行得通的。

我的父母对于我传道的决心，既不反对，也不鼓励。他们勉励我，当以信心尽力锻炼自己的身体、意志和心灵，以祷告的心等候主的引导。这忠告对我很重要，日后我常有机会经历和证实。

麦都思的《中国》一书强调以医疗传道的重要，因此我决定研究医学，作为日后工作一项重要的准备。我在家中读了一阵子书，之后便跑到赫尔市接受医学和手术的训练。我在那里充当一名医师的助手。起先，我在亲戚处找到一处安舒的居所，我工作所得的收入，刚好足够支付我的食宿费用，但我定意要为主的圣工奉献不少于十分之一，所以我决定离开这安舒的居所和愉快的环境，搬到近郊去。那里只有一房一厅，膳食自行料理，但我可以从容地将我全部收入作十一奉献。虽然变动颇大，却带来不少的祝福。

大约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朋友建议我思考主再来的问题，所以有一段日子，我花了颇多的时间来研读有关主再来的经文。在圣经的亮光引导下，我看到那带着复活的身躯离开世界的耶稣，将会照样的再来。主的再来，乃是祂子民最大的盼望，是我们在奉献和事奉上无比强大的动力，也是我们在试炼和痛苦中莫大的安慰。主并没有向祂的子民显明祂再来的时日，为要叫他们日复一日，时复一时，过着儆醒等候主回来的生活。我定意尽力作好迎接主的准备，就查验我自己的小书室和小衣橱，看看有没有多余不需要的书籍和衣物，把它们处理分送给一些贫苦的邻居，使我心灵感到得益不浅。

事奉的准备



Photographs by F. Howard Taylor.

KINGSTON SQUARE AND "DRAINSIDE."

1. The home of Mrs. Richard Hardey—first house on the right.
Mrs. Finch's cottage—last on the left. The room Mr. Taylor occupied is to the left of the front door.

To face page 119.

戴德生于赫迪医生位于赫尔的家中工作（图上）时租居的房子（图下）

我很快便发觉，原来自己也能过着远较从前刻苦简朴的生活。牛油、牛奶，以及其它奢侈的东西，我都不再吃了，主要的食品就是麦片和米饭，偶尔也吃点别的东西，以变换口味；所以少许金钱便足够供给我的需要。这样，我经验到自己用得愈少，帮助别人愈多，心中的喜乐和属灵的福气也愈丰盛，使我每天都尝到难以言喻的福乐。

每当想及到中国之后，生命的保障，日用所需，以至一切的援助，除了神以外，别无倚靠，因此，我非加强属灵的操练不可。在离开英国以先，我必须学习单靠祷告，借着神来感动别人帮助我。我的医生雇主非常忙碌，恐怕忘记按时付我薪金，就吩咐我到时候提醒他，但我决意不直接告诉他，只祈

求神让他记得，使我可以因着祷告得蒙垂听而得到鼓励。有一次，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我的好老板却记不起发放薪金，我发觉自己身边只剩下一块二先令六便士的硬币。那天晚上大约十时，我领完聚会后，一个穷人请我到他家里去替他的妻子祷告，因她快要死了。我立即答应。途中，他的口音露出他是爱尔兰人，我问他为甚么不请一位神父？他说他已尝试过，但神父要十八个便士才肯去，而他却出不起这钱。这时，我想起我全部的财产就只有这块硬币，又不能分为两份，若把它给出去，明天午饭便肯定没有甚么可吃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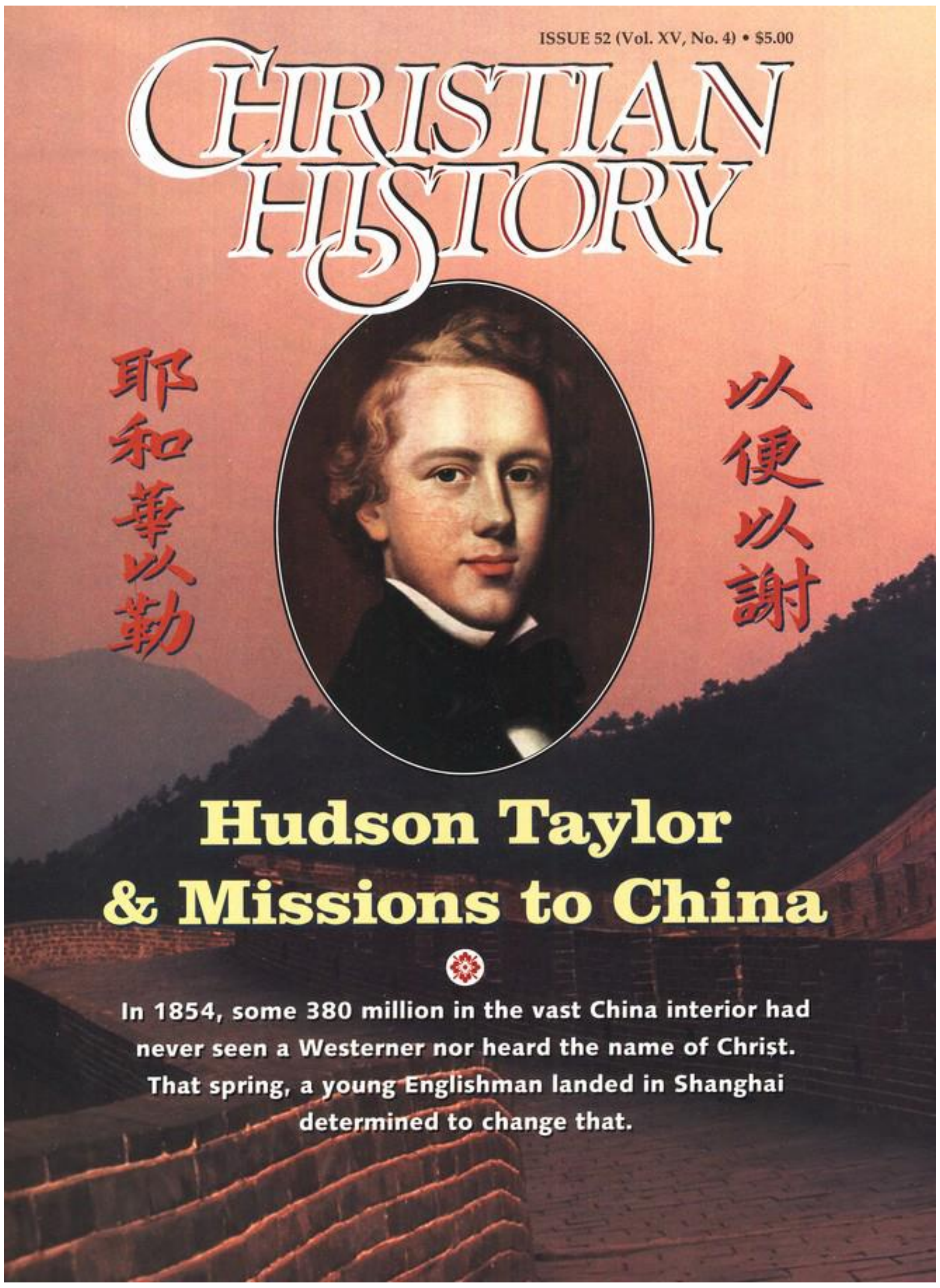
他领我上了一道破烂的楼梯，进入一间残旧不堪的小屋。眼前所见，触目惊心。四、五个小孩四围站着，凹入的双颊清清楚楚地显明他们饱受长期饥饿的厄困。倒在破烂的草床上是一位筋疲力竭的母亲，身旁是一个出世才三十六小时的婴孩，弱小不堪，连哭也哭不出声，听起来倒像在呻吟。我的心里一直在挣扎，我那令人憎恶的不信，阻止我顺服内心的感动，使我不肯把自己所有的救助他们。那时候，我无法说出甚么话来安慰这些可怜的人。我虽勉强为他们祷告了，但我不知自己怎样祷告的，可能语无伦次、断断续续。最后直到我把手放进口袋里，慢慢的把那块钱币抽出来交给那穷人，心里才得平安。那天晚上，在返回寓所的途中，我的心和我的口袋一样的轻省。我享受了一个快乐、安静的晚上。

第二天早上，锅里还有点粥可以作我的早餐，还没有把粥吃完，就听见邮差的敲门声，给我一封不知是从哪里寄来的信，打开来一看，里面有一块半英磅的钱币。只不过十二小时的投资，就收回四倍的利息！我马上立志，要把我省下来或赚回来的钱，存入这永不倒闭的银行。对于这个决定，我至今无悔。

祷告再蒙应允

两个星期过去了，我的老板仍然还没支付我的薪金，我发觉我的处境又回复到像那难忘的晚上一般。我的困扰并不在金钱上——只要我一开口提醒老板，任何时候就可以有钱在手，但萦绕在我心怀的是："我能不能到中国去？会不会因为我信心不足、能力不够，以致我无缘参与这宝贵的差使？"

一个星期又快过去了，星期六晚上，房租便要到期。那天下午大约五点钟，医生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不经意的问起："你的薪金不是又到期了吗？"我咽了两三下，尽可能平静地告诉他我的薪金已过了一些时间。想不到他回答说："啊！真是抱歉，只可惜你不提醒我，在今天午间我把所有的钱都存进银行里去了！"



他一离开，我便立即回到我的小书房，在主面前倾心吐意，直至心里再次充满安息和喜乐。那天晚上，我刚打算熄灯时，便听到医生的脚步声；他来告诉我说，有一位顶有钱的病人，竟然在十点钟过后跑来付医药费。他就把刚收到的部份钞票给了我。这件事使我满心欢喜快乐的赞美主，我终于可以到中国去了！以后，我无论在什么地方，遇上极度困难的事情时，每当忆起这次经历，都带给我极大的安慰和力量。

又过了一段日子，我觉得应该离开赫尔，到伦敦医院修习医学课程。我挚爱的父亲表示愿意支付我在伦敦的一切费用；同时，中国布道会的委员会也表示愿意供给我在伦敦的生活费用。但经过祷告等候，在主的引导之下，我清楚知道两者的好意都不可接受。我便写信推辞了两者的好意，单单的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里。

伦敦的生活

伦敦不比赫尔，可以生活得那样省俭。为了减轻支出，我与表兄同住一房，自己负责自己的伙食；这房子离医院要走上四哩路。最经济的方法，莫如吃粗面包和喝白开水；这样，便可以把主的供应尽可能用得长久。我的晚餐和早餐，就是我每天要从医院跑一大段路回家

时买的，一大条粗面包只值两便士；中午则吃两、三个苹果。这样的饮食，便能供给我足够的气力，每天走八、九哩路。

我以前在赫尔的房东太太，丈夫是伦敦一轮船公司的大副，于是她托我每月到船公司代领她丈夫另一半的薪金，然后邮寄给她，好节省汇费。有一次，她写信要求我尽快帮她领取薪金，以便支付欠款。这时我正为考试繁忙，刚巧我手头上有足够的钱，就预先垫款寄钱给她，打算一考完了试，便前去提取来还给自己。不料，当我到船公司提取到期的薪俸时，主办的职员告诉我，不能把钱给我，因为那大副已擅离职守，跑去掘金去了。

同一天晚上，我在缝钉一本簿子，好作为记录课堂笔记之用时，一时不慎，刺伤了右手的食指；顷刻间我便把此事忘记了。次日，在医院里我照常解剖尸体；这病人是死于败血病的，解剖的人若不小心，有甚么破损，便足以致命。我当然特别小心翼翼，到中午时，我感到十分疲弱，四肢无力，似乎要呕吐。下午上完一节课，我整条手臂和右半身痛得很厉害，病势已非常沉重，连旁人也看出来了。我跑到手术室收拾仪器，并将这情形告诉负责的医生。他认为我已被热病感染，劝我立刻叫一辆马车回家，料理后事。“因为，”他说：“你是一个死人了。”但我觉得中国有工作在等着我，我是不会死的！无论病势如何严重，我必能脱险。所以对他的提议，一笑置之。

那天我勉力步行回家，进了屋里，痛得晕了过去，苏醒时已经被移放在床上。我一位住在附近的舅父跑过来看我，并且叫来他的私人医生给我诊治。这时候我身体虽然很是痛楚，但我所记挂的，乃是不要让父母知道我的病情，以免我失去察看神怎样为我解决问题的机会。我得到舅父和表兄的答应，不写信通知我的父母。于是我小心翼翼的挨过危险期。日以继夜

的痛苦慢慢过去，数星期以后，我的体力已足够使我可以步出房间。这才听说另两个与我同时进行解剖的人，已经死去。

信心被坚固

我的医生劝我到乡下休养一段时期，直至恢复相当的体力和健康为止；若太早工作，恐怕后果不堪设想。但我决意不让乐意帮助我的人，晓得我的困境，目的是要单从那听人祷告的主取得帮助，好叫我的信心得以坚固。主引导我再到那轮船公司去，询问上次提取不到的薪金。而我付不起车资，并且发放薪金的可能性不大；经过祷告等候神之后，我肯定这是祂的旨意，便凭信心接受主所赐的力量，毅然举步前行。这船公司离我住处至少有两哩。因我的信心已蒙坚固，靠着奇妙的神帮助，使我一步步终于走到目的地。

戴德生21岁，离开父母，远赴中国

船公司那位负责发放薪金的职员，看见我脸色苍白，有气无力的样子，便问起我的健康来。我告诉他最近生了一场大病，医生劝我到乡下休息一下，但想到临走之前，最好还是上来问问，那大副擅离职守跑去掘金的事，究竟有没有弄错。“啊，”他说：“真高兴你来了，离职出走的原来是另一个同名同姓的熟练海员。”就这样，我得回了从前垫付的钱，便又去找那诊治我的医生，想要清还账项。医生很客气，不肯让我这个医学生付钱，只收下奎宁药的药费，只算八先令。办妥这件事情以后，我算了一算，余钱刚好足够我返回老家之用；我知道这是神为我作的奇事。我的医生是不信主的，当我把上述的经历一一见证给他听后，他眼中含着泪说：“我愿意把我所有的换取你的信仰。”“可是你却不需要花费一分钱。”我很奇怪他怎么这么想。

拯救的大能

康复以后，我重回伦敦继续我的学业，再投入繁忙的医院生涯和紧张的课堂生活。快要到中国去的时候，我被派每日替一位患了脱疽病(皮肉腐烂)的病人洗涤双脚。他虽来自基督

教家庭，但自己却不信有神，对宗教极为反对；并且他的脾气很暴躁，把想读圣经给他听的人赶出去。曾有一位牧师来探访他，盼望能给他一些帮助，但他竟把唾沫吐在他面上，不许他开口说话。

一开始要照料他时，我为他花了许多时间祷告。头两、三天，我绝口不提信仰的事。由于我特别小心洗涤他的病腿，而且尽量减轻他的痛苦，他很快便对我的照顾表示感激。有一天，趁着他向我表示谢意的时候，我战战兢兢地向他解说我为甚么这样殷勤服事他，指出他的病情是何等的严重，亟需要靠着基督，得到神的怜悯。很明显的，他以最大的自制力把嘴唇紧闭，翻身背着我，不发一言。

我天天哀求神，在他离世之前拯救他。每一次为他洗涤伤口、减轻他痛苦的时候，我总会对他说一、两句“神会祝福”这一类的话。但他总是翻身背向我，看来是很愤怒似的，从来不搭上一句话。努力了一段日子以后，我感到灰心失望。他看来不单没有回转，反而愈来愈心硬。有一天，替他把腿洗涤好后，我洗濯双手，然后一反常态地没有站在他的床边对他说话，径自走向房门口。后来我停下来，犹疑了片刻，回头望他，察觉他惊异的脸色，因为这是我头一次没有替主向他说话便打算离开。我不能再忍下去，泪如泉涌，我走回去对他说：“朋友，无论你听不听，我必须说出我心底的话。”然后很恳切地跟他谈，并且带着泪水向他表示我多渴望与他一起祷告。他并没有翻过身来，只说：“如果这样能安慰你的话，请随便吧。”我当时的喜悦真是难以言喻。不用说，我立即跪下来，为他向神倾心吐意。我相信就在此时此地，主已叫他的灵魂悔改。

此后他从未表示不愿意听我讲道，或是替他祈祷。过了几天，他切实地接受基督作他的救主。这位喜乐的病人在悔改之后，存活了一阵子；这段期间，他努力见证神的恩典，永不言倦。虽然他的病情令人感到十分痛苦，但由于性格和举止的改变，使得服事他的人也觉得照顾他不再是一件苦差，而是真正的乐事。我在中国早期传道的一段日子中，许多时候，环境看来要使我的一切努力陷于绝望，但当我念及这人的重生得救，我便得到鼓励，坚持下去，无论人们听不听，继续宣讲神的道。

中国之行

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我要离开英伦，远赴中国。一八五三年九月十九日，中华传道会在“敦费士”号的船尾舱房里，为我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聚会，差遣我到中国传道。

我挚爱的母亲来到利物浦跟我话别。她与我一起进入小舱房，母亲用慈爱的手，整理我的小床，然后坐在我的身边，同唱我们长别前最后的一首诗歌。我们跪下，母亲为我祷告。因船快要开行了，于是只好珍重道别。为了叫我好受一点，母亲尽量抑压心内的情绪。分别

后，她走上岸。我孤单一人立在甲板上，船开向水闸，她也跟着往前走。船过了水闸，这次我们真的要分别了；猝然间一道哭声从母亲绞痛的心决堤而出，像刀一样刺透了我，使我永远也不会忘怀。这一刻我才完全明白“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的意义。

船启航不久，我们遇上了秋分的暴风，风浪很大，几乎出不了麦士河口。十二天来，我们都是在爱尔兰海峡荡来荡去，出不了大海。船长和船员虽然百般努力，终究是无济于事。九月二十五日晚，我们已漂流至嘉拿温湾，与海岸的距离愈缩愈短，最后离岸边的巉岩只一箭之遥。基督徒的船长对我说：“我们活不上半小时，你对主呼召你到中国传道有甚么想法？”我满心喜乐的告诉他，我对我所蒙的呼召不作他想，我深知我一定会到中国去；但假如神有别的安排，我总以顺服祂的旨意为念。

不到数分钟，风向转了两度，我们得以逆着风驶出海湾；但船首的斜桅摆动，船受到严重的损伤。几天以后，当我们驶出了大海，便在船上进行了彻底的修补。 航程中，因为没有风，而损失了不少时间。通常是在日落后才起微风，直到天明；日间却没有风，船便停下来，任由漂流。有一次当我们接近新几内亚的北部，离陆地只有三十哩之遥。 早上，船长发现有一股时速达四海里的水流把船带向暗礁，恐怕在黄昏前船便要触礁了。所有人都同心协力，想把船头掉转，使船驶离海岸，但终告失败。大家静立甲板上一段时间，船长对我说：“所能作的已全作过了，现在只好等候结局。”我心里头掠过一个思想，便答道：“不，我们还有一件事未作。”“甚么事？”他问道。“祷告，”我回答说：“让我们同心合意地求主马上赐给我们清风。”船长同意我的建议。我们四个基督徒先一同祷告后，便各自退回自己的房间等候神。我经过一段简短而深入的祷告后，觉得神已允准我所求的，不能再祈求下去，便很快的再走上甲板，但见船樯上最高的小帆在微风中颤动，我立刻叫大副把主帆放下来。数分钟后，我们以每小时六至七海里的速度，迎浪前航，很快的我们便脱离了险境。 在抵达中国之前，神藉此鼓励我，叫我将一切的需要，借着祷告带到祂的面前，并且信赖祂必因着祂独生子之名的缘故，在我每一个紧急关头里帮助我。

当时没有飞机，只有乘这样的船从英国到中国一般需要6–8个月，大海上的各种危险随时会要他的命。

早期的宣教经验

我在一八五四年三月一日抵达上海；所遇到的困难，完全是我始料不及的。那时，一股称为“红巾”的叛军正占据了上海，与政府军对抗。对于欧洲人来说，要住在外滩租界以外的地方，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而要在外滩租界找房子，又决不是有钱便可以办得到的，更何况我是一个身无长物的异乡人，前途可说是一片黑暗。我身边有三封介绍信，如今成了我唯一的指望了。内中一封信的介绍人是我所熟悉和敬重的好友，我自然特别看重这封信。我立即打听信里所提及的人，但发现他在我到中国途中，患上热病，已死去一、两个月了。

听到这则消息，心里好生忧愁失望。只好打听另外一封信所介绍的宣教士，结果又使我失望——他已回到美国去了。袋里还有第三封信，由于这是一位不太熟的朋友写的，所以我对此信并没有像上述两封信那样，寄以厚望。可是后来事实证明，这乃是神藉以帮助我的渠道。这封信是写给伦敦会的麦都思博士(Rev. Dr. Medhurst)，他把我介绍给雒魏林医生(Dr. Lockhart)，乐医生把我安置在他家里，我在那里住上了六个多月。我第一个中文老师艾德根博士(Dr. Edkins)——就是由麦博士替我请的，他跟已过世的韦烈先生(Mr. Wylie)，在语言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忙。

这一段日子确是充满了纷乱和危险。有一天我和韦烈先生出城时，正遇到河对岸的炮台开始向城里攻击，炮弹的呼啸声近在身旁，两名正与韦烈先生倾谈的中国苦力，由于躲避不

及，不幸都受了伤，他们因拒绝把受伤的足踝锯除，结果都死了。有一次，我和一位宣教士在他家里的阳台上，突然之间，一枚流弹在我们中间掠过，炮弹陷在墙里。

在雒魏林医生家里住了六个月后，我在租界外租了间房子，开始在邻近的中国人中展开一点点的宣教工作，数个月间，颇有成效。由于晚间附近经常有零星战事，我惟有放弃睡眠，只在白天休息。一天晚上，离我家极近处发生火警，我爬上屋脊看看是否需要走避。一枚炮弹击中内院对面的屋脊，片片碎瓦如雨般落在我身上，而那枚弹珠却滚落在下面的院子里。事发后不久，我便放弃这所房子，搬回租界去了——这个决定绝对不算太早，就在我把最后的行李搬离之前，这幢房屋已被烧毁至片瓦不全。

Photograph　　By a Chinese.

WATERWAYS NEAR SHANGHAI.

Many of which Mr. Taylor visited in his early evangelistic journeys.

戴德生租乘小船沿运河、水道向华人布道派圣经

在这一段受试炼的日子里，战争的恐怖、残暴和悲惨，对我这一个生性敏感的人来说，真是一个严酷的考验。寒冷、饥饿、在危险的黑夜里守望无眠，其中的痛苦岂是旁人所能了解；此外，又添上开荒者所有的浓烈孤独感觉，这份孤寂在许多情形下根本不可以对人透露，否则，别人会以为你在暗示向他求助。但这些都是神妥善而精心的选择，以及周到和爱心的安排，使我在这种环境中经历神话语的甘甜、神同在的真切和神帮助的宝贵。而事实上，这些日子正是叫我倒空自己，学习谦卑，而完全顺从并仰赖神的带领。

一八五四年的秋天，在艾德根博士陪同底下，我们平安地完成了为时约一星期的旅程，深入内地。当然，讲道是由艾博士负责，而我则帮忙分发书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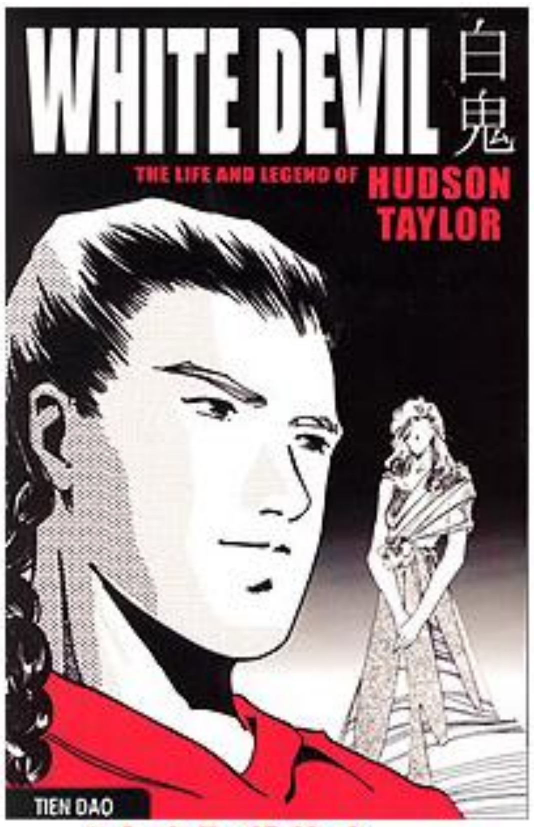
首次布道的成果

一八五五年春，与英国教会传道会的包尔腾牧师(Rev. Burdon)联袂作了一次布道，途中颇历艰险。四月二十六日，我们从狼山要到通州。在船上吃过早餐，在未进城之前，我们把自己交托在天父的手中。

我们的中国教师极力劝告我们不要进城，因为该地的军人有种种不法的行为；但我们心意已决，靠着神的帮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我们。我们做了一些安排后，便把书分成两

袋，只带着一个仆人进城；走了不远，仆人开始怕了，便要求请准让他回去。我们向来不勉强别人冒险，自然立即答应他，决定自己背起书袋。就在这一刻，我们遇上了一名长者，他很诚恳的劝告我们止步，否则必会吃尽通州军队的苦头。我们感谢他的好意，但我们决意无论前面是锁链、监牢，乃至于死，仍要靠着神的恩典，未传福音便誓不离开通州。

途中经过一小镇，约有千个村民；我就在那里以国语对广大的群众宣讲耶稣的福音。我心灵满有祝福、喜乐和平安；而出人意料的，我的口舌竟可以畅所欲言。我们又在那里分发了一部份的新约圣经和福音单张。 将近旅程的终点，我们抵达城的西郊；我心里闪过早期基督徒在遭遇逼迫时的祷文：“主啊！看他们现在所施的威吓，请赐你仆人勇气，得以放胆讲论你的道。”经过这样的祷告，我们把自己交托在祂的看顾中，跟着拿起书册，举步沿着通向西门的街道而行。离城门还远的时候，一个孔武有力的人，在半醉之下显得格外粗暴，他抓住包尔腾先生的两肩。我的朋友尽力挣扎，好把他摔开去。我上前看个究竟，但立时被十数人包围，把我们赶入城去。他们以最粗暴的态度对待我们。最初抓住包尔腾先生的大汉，不久便转过来抓我，极尽凌辱。他屡次把我摔在地上，扯着我的头发，又拉我的衣领，使我几乎窒息。我的双臂和肩膊都给抓得青紫。



“白鬼”戴德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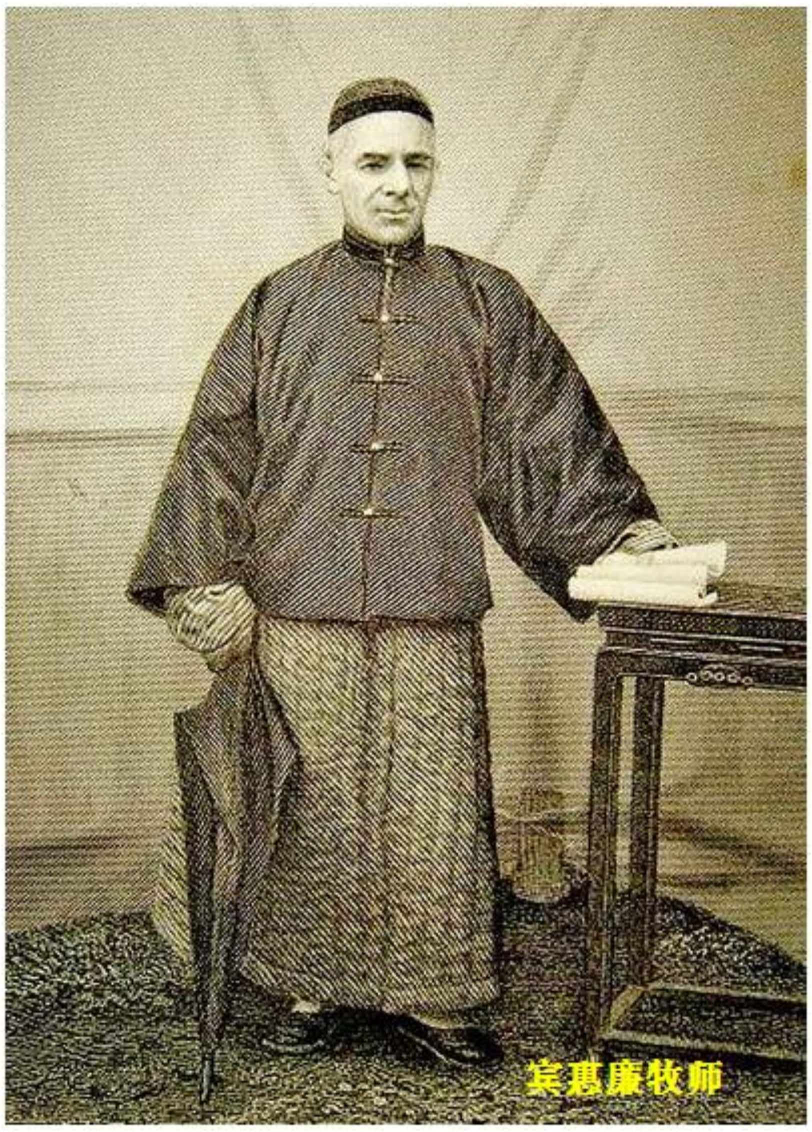
途中，他们争论怎样处置我们；温和的士兵主张送我们到衙门，其它则主张立即把我们处死，不必等候上头命令。我们二人心里却完全平安，并且彼此提醒，使徒曾经以配为基督受苦而快乐。 我们一直给拖曳着，弄得浑身无力，一身是汗，舌头干得黏在上颚，好不容易抵达县衙。我们被带到陈大老爷的面前，他先前曾出任上海道台，自然知道对待外国人不可无礼。他对我们甚是客气，请我们到内院，我把这次行程的目的说明，再把圣经和福音单张送给他，他称谢收下。我把书中的内容简略介绍一下，并简单地把我们的信仰向他说明，他很留心听，而四围的知事、衙役、侍从等人自然也在听了。然后他吩咐人拿来点心，我们欣然领受；他也与我们共进茶点。

坐了许久，便请他准许我们到城里游览一下，并分发带来的书册。他欣然同意。我们又提到这次受了很大的侮辱，但是不打算追究，因为明白到当兵的知识很低。为了避免再度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要求他发出告示，规定以后不得再有类似的骚扰、凌辱。这一点他也答应了，还礼貌周到的亲自送我们出去，又差派几个衙役沿路照顾打点。我们很快的把书册送完，安然离城，回到船上。

与宾惠廉同工

一八五五年底，在神带领之下，我认识了英国长老会传道会的宾惠廉牧师(Rev. William Burns)。我们联袂出发，住在船上，往江苏之南、浙江之北的大城小镇宣讲福音。在这之前，我在麦都思博士建议下，放弃了西服，改穿中国装束。改变服式可带来不少好处。而宾先生当时尚作英装打扮，他看见我年纪虽然较小，各方面的经验也较浅，讲道的时候，却有人肯静心聆听，而他的听众只是好奇的顽童，可没半点诚意听他讲道。我又受到乡民的邀请，在他们家里作客，而他却遭人婉言相拒。经过数星期的观察，他终于改穿中装；以后他也不断领略到其中的方便。

宾先生对神的话语极之爱慕，生活圣洁可敬，并且与神紧密相交。数个月来与他在一起，使我受益非浅。他丰富的经历和属灵的洞察力，以及他对宣教的一些观点，对我日后组成中国内地会，播下了积极有效的种子。



通常，我们所到之处，无论是大城小镇，每天在向神祷告之后，大约早上九时许，便提着轻便的竹凳，离船上岸。找到合适的地方后，我们其中一人便站在竹凳上，开口讲述福音。这样大约要讲二十分钟，讲的时候，另外一人则在旁边祷告。然后两人互换位置，好叫刚才讲话的人得着休息。这样过了一两个钟点，我们便转移地方，再次宣讲福音。中午回到船上吃午饭、团契、祷告，然后再出外工作，直至日暮。

有时，我们也遭到恶徒的骚扰。有一次，在浙江北面边界的乌镇，那里民风骠悍，是盐枭和坏人的避难所。船遭到袭击，他们用从附近田里弄来的大块硬泥，向船上掷来，船篷被打破，船身的上半部也毁烂了一大片，船内的东西全给污泥盖着。感谢神的保守，没有人在这事件中受伤。过后，我们仍旧离船上岸，向群众讲道。下面是一位在事件前曾经听过福音、接受单张的人，写给我们的字条，使我们深得安慰与鼓励：“日前恳请宾氏及戴氏二夫子送我好书。适有我镇恶徒，心为‘撒但’所迷，未识‘大卫之子’，以致胆敢‘拉加’、‘魔利’，损毁尊船。诚蒙俯允日后赐下书册，特此致谢，并求惠赠：《新约

全书》、《善人将死嘉言录》、《基督徒要道》、《基督教要理》、《令全世界快乐之途》等各一册。谨此问安，感激不尽。”

呼召往汕头

我们被迫离开乌镇，回到上海后，遇到一位在汕头做生意的基督徒船长，他在我们面前一再强调那地方的需要，并且说到有英国商人在那儿贩卖鸦片、奴隶，但却无英国宣教士传讲福音。神的灵感动我，使我觉得是祂的呼召；但数天下来，我仍是不能顺服这呼召。我从没有遇上一位像宾惠廉先生那样属灵的父亲，也从来没有享受过那样圣洁快乐的团契生活；我对自己说，这决不是神的旨意，要叫我们分离。

一天晚上，我们造访罗尔牧师的家。用过茶后，罗夫人为我们弹唱一曲，名叫“传道人的呼召”，我大受感动。回去后，我满脸泪水的告诉宾先生，主如何引导我，而我怎样抗拒，不愿意离开他，独自前往这新工场。宾氏听时，神色十分诧异，看来只觉快乐，没有一点难过；他随即回答说，在同一晚上，主也呼召他到汕头去，他当时只觉得一点惋惜，那就是要和我分手。将汕头的需要，带到我和宾先生跟前的基督徒朋友包华士船长，听见我们决定前往那里传道时，真是大喜过望，欣然答允免费给我们乘搭他的船去汕头。

我们在汕头所面对的困难和危险，以程度之严重、发生的频繁而言，我们以前在别处的工作，便显得安全和轻省了。广东人对外国人的憎恨和鄙视，简直刻骨铭心，“洋鬼”、“洋狗”或“洋猪”乃是最常见的称谓。但这一切却使我与主有着前所未有的深切交通，祂也曾被人鄙视和弃绝。探访村落，随时都有被绑票胁持，要求赎金的危险，村民一般称这一带为“没有王法”之地。但在这样的环境下，神往往彰显了祂照顾保守的大能。 过了四个月，本地一名官员生病，当地的医师尽皆束手无策。这官员后来听闻某人说起，谓曾经得我医治，颇见成效，于是便向我们求助。神赐福我所用的药物，这官员康复了；在感激之余，便协助我们租下整幢房屋作医院和药房，而我就回上海去取存放在朋友处的药物和手术器具。

马礼逊翻译的圣经《神天圣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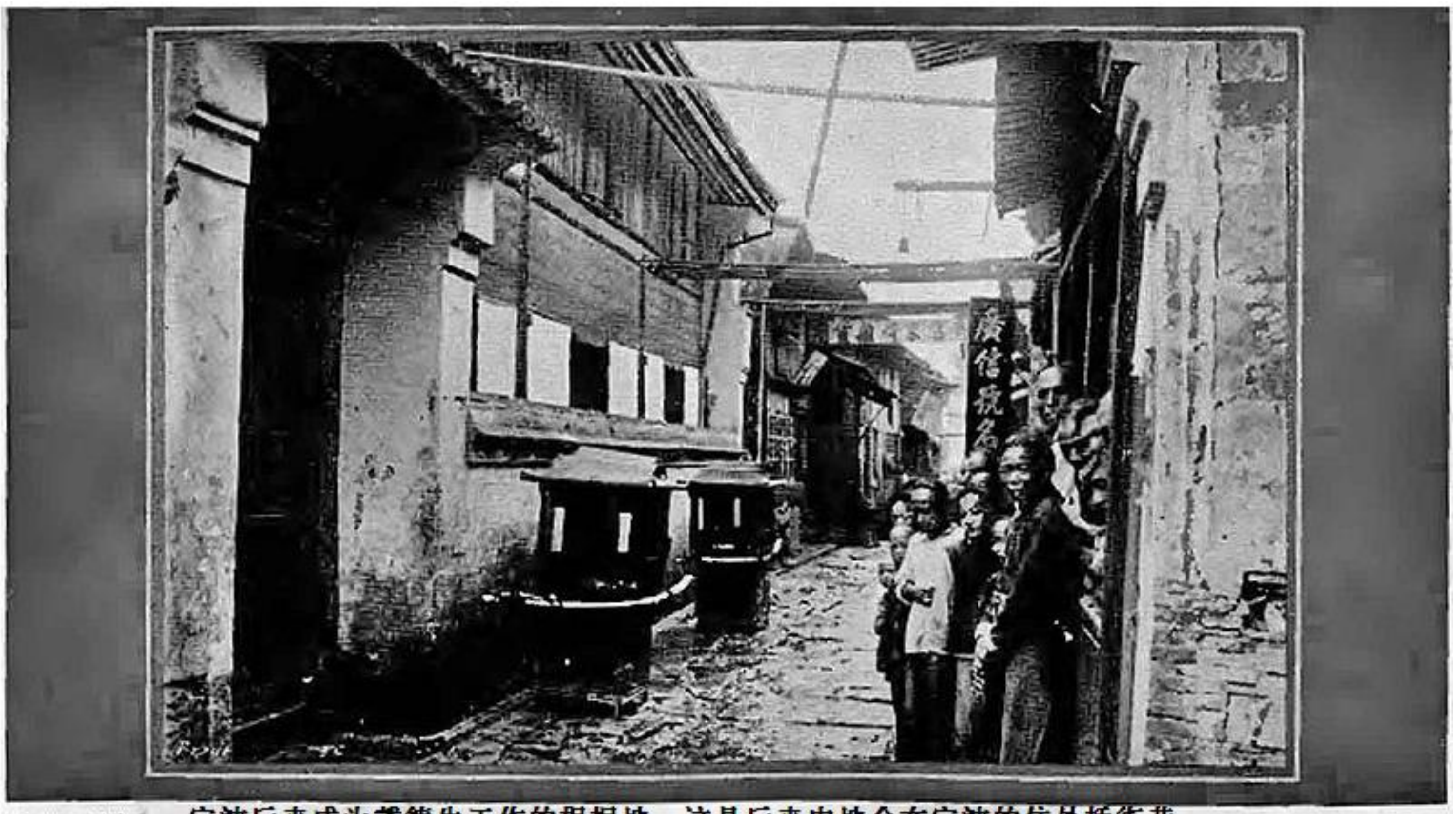
当我回上海而不在汕头的期间，有一晚，一批强盗闯进宾先生的寓所，把他们的东西都抢走，惟独不带走任何书籍，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东西不值钱。第二天清早，他们给敲门声惊醒，原来村民来要买书。到了早餐时间，他们不但有足够的现金可以购买食用，并且有路费

可供其中一人前往附近的双岛，去取得接济。买书者络绎不断，使留下来的人一无所缺；但到了第三日，一本书也卖不出去。正当卖书得来的钱刚好用尽，去的人却带着供应回来。

人意不如神意

我在抵达上海以后，才发觉以前寄存药物和器具的房舍已遭大火焚毁，所有药物和大部份的器具已荡然无存。药物在上海非常昂贵，而我身边的钱有限，唯一的办法就是亲赴宁波去找属同一传道会的巴格尔医生，求他帮助。我原预期事情顺利办妥后，很快便能回到汕头，与所敬爱的朋友宾先生相聚一起，在那里展开工作，神却有别的安排。途中，全部行李给仆人窃逃，我还以为彼此失去连络，到处打听仆人和挑夫，历尽艰险，延误行程。

等到事情办妥后，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征兆已显，南方大部份的宣教活动已遭禁止，宾先生也来信劝止我回到汕头。几个月来在汕头一带地方的工作，的确烙有神赐福的印记；但神的意思并没有叫我们任何一人留在那里，收取庄稼。宾先生不久也被中国官员逮捕，并且下在监里。神的引导实在十分奇妙，祂首先阻止我重返汕头，然后引领我在宁波安顿下来，并且使宁波成为我日后工作的中心。



Photograph by 宁波后来成为戴德生工作的根据地，这是后来内地会在宁波的住处桥街巷 G. Whitfield Guinness.

THE HOME TO WHICH MR. TAYLOR BROUGHT HIS BRIDE, ON BRIDGE STREET, NOW THE OLDEST STATION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By the large door on the left one enters the Chapel, above which are the dwelling-rooms overlooking the street.

我抵达宁波时是一八五六年深秋。一八五七年是动乱的一年，当在宁波的广东人获悉英舰炮轰广州的可怕消息后，他们愤慨和暴怒的情绪就像怒潮般席卷一切。他们立即着手计划袭击城里和附近外国人的居所，这计划也取得了道台的准许，但外国人却完全蒙在鼓里。碰巧在这群策划屠杀的人当中，有一个人，他的朋友是在宣教士的家里工作；他担心他朋友的

安全，因此便警告他，促他不要给外国人做事。这仆人把事情透露给他的主人知道，我们才晓得自己已身在险境，便聚集祷告，寻求至高者的保护。

当我们在祷告之际，主已开始动工。祂带领一位较低级的官员——宁波海关监督，往见道台，与他力争，说这种愚蠢的作法，必带来滔天大祸，引致其它各地的外国军队进侵，把全城夷为平地，涂炭生灵。最后道台收回成命，命令广东人不可发动攻击。这正好发生在我们寻求神庇佑的那一个晚上。

在宁波的第一个果子

有一次，我正在传讲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有一中年人站起来，在他的同胞面前见证他在福音大能里的信心。 “长久以来，我一直在寻找真理，”他诚恳地说：“在我之前，我的先祖亦一直在寻找，但却没有找到。我曾经远近寻访，却一无所得。在儒、佛、道三教之中，我找不到安息；但今天晚上，我从听闻的福音当中，终于得到安息。自此以后，我是耶稣的信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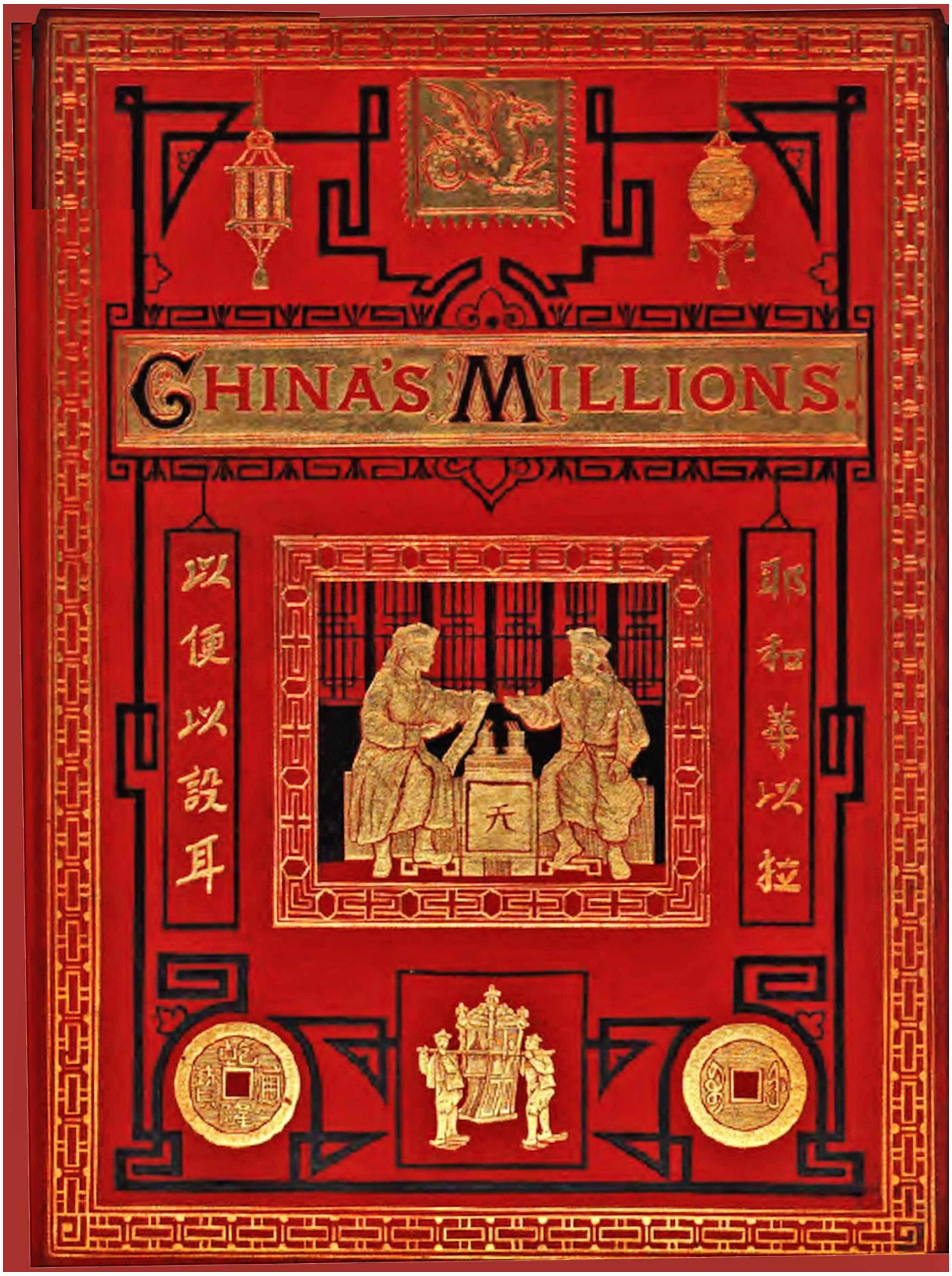
这人是宁波改革派佛教徒中一名居领导地位的执事。在他归信救主后不久，他以前所主理的佛教团体有一个聚会。我陪同他到达会场，他就在他以前的信众面前，见证信主后所得到的平安。不久之后，他以前一位朋友也悔改归主，接受洗礼。他们二人，从此长期不断地向人传讲这大喜的福音，直至离世。

在他悔改后数天晚上，他问起福音在英国传了多久。我告诉他，我们听闻这福音已有数百年了。“甚么！”他惊讶万分地说道：“怎可能你们拥有这福音达数百年，至今才到来传给我们知道？为要寻找真理，我的父亲花了近二十年的光阴，死的时候仍一无所得。啊！为甚么你们不早点来呢？”

按时的供应

就在我到达宁波的那一年，我花了很多时间思索我跟中国布道会的关系；布道会给我薪俸，使我生活用度没有缺乏，但布道会本身却常常欠债。可以说，我所收到的薪金，往往是布道会借贷得来的。据我看来，神的工作若因为经济问题，难以继续的话，那准是这工作已到了一个地步，或发展至一个特别的阶段，或是已到了一个时候，不再是神所要的工作了。为免良心不安，我写了封信，要求从明年起辞职。

我所作的决定，在信心上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考验。我完全不肯定神要我替祂作些甚么，又或者祂会否满足我的需要，好叫我能够像以往般工作下去。我没有期待朋友来帮助我，也不晓得神会透过甚么途径来帮助我；只要祂给我最低限度的供应，叫我能够养活自己，我便愿意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向不信的人传讲福音。假如这不是祂的旨意，我打算甚么工也去作，以养活自己，然后把剩余的时间全部腾出来，从事合神心意的宣教工作。



至于神如何祝福带领我、供应我，我永远也不能尽说。偶然经费上发生困难，总是因为要使饥饿的人得到饱足，使濒死的人得到希望；至于个人需用方面，却从未有过缺欠。在我到达宁波后一年，我曾服事一位患上严重天花的美国牧师，之后，本应把服事病人期间所穿

过的衣服烧掉，以免把病传染别人。但当时手头上的钱却不够我添购新的衣服，我惟有祷告。主答应我的祈求，使我出乎意外地获得失落已久的一箱衣服。这箱衣服是我在前年初夏离开汕头远赴上海时，留给宾牧师看管的。这批衣物及时到达，无论在时间和意义上，都叫我对父神的供应有一番甘甜的体验。

我们每天给穷人派发早餐(主日除外)，平均约七十人份。有一个星期六早上，我们清缴了一切开支，又购备了明天的食用之后，手上已不名一文。我们不晓得神如何为我们预备星期一的需要，但在我们的壁炉上却挂着一幅中文对联——“以便以谢耳”(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和“耶和华以勒”(主耶和华必为我们预备)。就在那一天，我们收到了一张二百十四元的支票。星期一早上，贫民照常来吃早餐，因为我们深知这是神的工作，神必预备，所以没有通知他们不要来。

又有一次，我们身上只有一文钱。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难处告诉主，祂听取我的祷告，救助我们脱离困境；还在我们跪下祷告的时候，从英国寄来一封信，信中附有一份捐款。按时的供应，不但解决了燃眉之急，并且叫完全信靠神、又愿意事奉祂的人不至于羞愧。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一九五八年，我和所爱的妻子结婚。她不但是神赐给我的宝贵恩惠，她也是许多人的祝福。在那十二年里，她把生命呈献给爱她的人和中国。一九五九年初，我挚爱的妻子染病，身体十分虚弱；到了最后，看来已没有复原的希望。我试过一切方法，但都没有果效，负责诊治的巴格尔医生也感到束手无策。生命正迅速消逝，唯一的盼望就是神。就在我同宣教士们为我妻子祷告的那一刻，我想起一个尚未援用的治疗方法，就离家到巴格尔医生处商量，他也赞同我提议的方法，可是回到家里一看，病人在没有接受任何治疗之下，病情竟大见好转。枯槁憔悴的面孔，已转为安静舒适的睡容，且不见有任何不利的病征阻碍病人康复。

同年秋天，巴格尔医生的妻子遽然离世。因需立即把他那失去母亲的儿女送回国去，就要求我接办他的宁波福音医院。经过几天等候神的引导，我就接受了巴格尔医生的交托。一向以来，医院的经费都是从巴格尔医生诊治外国人所得的医药费而来的，他离去后这收入来源便告中断。但主预知我们的需要，医院的经费正络绎于途。就在快面临山穷水尽之际，我收到朋友自英国寄来的信，当中附有一张五十英镑的支票。朋友在信中谓他最近丧父，得了一份遗产，他决定不将这笔钱花在生活享受上，而愿意用在主的圣工上。他先寄上五十镑，全由我决定它的用途。他只需要知道这些钱是如何运用，以及是否再有别的需要。

主不只在经费上听我们的祷告，许多病人的生命都得蒙救治，看来全无希望的病居然医好了，一些严重而危险的手术也成功了。神又赐下远比这些更为永久的福气。许多人接受了福音；在九个月中，医院里有十六位病人接受了主，登记加入宁波教会的有三十人。

创立中华内地会

照料医院的责任，加上我其它的传道工作，使我的身体和心灵长期劳累，健康迅速地衰退下去，不得不返回英国疗病。在我来说，因为健康不佳而要放弃在中国为神工作的机会，那简直是一场灾难；更何况工作刚刚比以往更有果效，突然要离开宁波那一小群极需照顾和教导的基督徒，心内倍添愁烦。我的忧伤并没有因为返抵英国而减少，因为医疗报告显示，至少在未来数年内，我不可能重返中国。我当时一点也不晓得，神要我与中国作长久的分离，乃是必须的；身在宁波的时候，四周的呼求压得我透不过气，叫我无从想及中国内地其它地区有着更大的需要！在英国的数年间，我每天注视着挂在书房墙上的巨大地图，辽阔的中国内地，以及我曾经为主工作的小小地方，都与我同样接近。祷告是唯一可以减轻我内心重担的方法。

在这数年间，我也有更多时间深入研读圣经。如今我才明白，若没有在这些日子得着神话语的喂养，以我当时的属灵基础，实在无法成立像中华内地会那样的宣教组织。

数月来恳切的祷告，以及经历过无数次的徒劳和失败，我深信要推行中国内地的宣教工作，亟需成立一个特别的机构。当时中国内地有十一个省份没有宣教士，我求主每一省派遣二人前去，另加上二人往蒙古，我求主一共差遣二十四名同工到中国去。我不断为此祷告，很快便有不少年青人愿意献身宣教。神在我家附近为我们预备了地方，使他们能住在一起，接受训练，以投身于传福音的工作。

Taylors and missionary candidates in 1865中华内地会创始人，中坐的是玛丽亚和戴德生

第一批传教士成行

一八六五年，中华内地会宣告成立。捐款源源而来，超过所需要的数额，我们甚至印了一张通启，让大家知道一切开支所需，已蒙听人祷告的神赐给我们了。

有一次，我获邀前往一处村落讲道，内容是有关中国宣教。我答应了，条件是不收捐献，并要求刊登在节目单上。负责邀请我的先生在聚会中任主席，他说从来未有遇见这种要求；但他终于答应了。会中，靠着一张大地图之助，我陈述了中国的地理和人口分布情形，以及这国家对福音的极度需要，许多人明显地受了感动。

聚会结束的时候，主席说应我所请，节目单上声言不收捐献，但他感到许多与会人士，如果没机会为这善工奉献一点金钱，他们必会十分难过，感到良心不安。他认为不收捐献只是我个人的意愿，我不应违背众人的心意。但我却恳请他们持守我们的协议，并且指出我不收捐献的理由，就是不想与会的人士，基于一时的情绪，就当时的方便而奉献；我建议他们回到家里，细细思量中国迫切的需要，然后求问神到底要他们作甚么。经过思虑和祷告后，如果觉得神只需要他们在金钱上奉献，那么他们可以把金钱捐献给任何在中国宣教的传道会，或将它寄到我们在伦敦的办事处。但很多时候，神所要的并不是金钱的奉献，而是要他们献身于神在外地的工作；或是要他把比金钱远为贵重的子女，奉献给神的工作。

次日早餐时候，主人稍迟才来到，并且承认他昨夜睡得不大安宁。他说：“戴先生，我想了整晚，昨天我以为你对收捐的观念是错误的，现在我承认我的看法改变了。昨晚当我想及无数中国灵魂像流水般向着黑暗涌进去，我只能像你所提议的喊道：‘主啊！你要我作甚么？’我想我已得到祂的引导，这里便是了。”他交给我一张五百镑的支票，又说假使昨天收捐的话，他只打算捐出数镑，但经过一夜的祷告，他便献上这张支票。

不用说，我对这份厚礼感到十分惊奇和感谢。用早餐时，我又收到一封由奇力马田公司寄来的信，通知我可将“兰茂尔号”的客舱全部包给内地会。我立刻跑到船上去，看见一切都合适，就订了下来。 五月二十六日，我们坐“兰茂尔号”启航到中国去。同行的有十六名传教士。于是内地会的工作正式展开了。

—— 戴德生

兰茂尔号成员离开英国前在一起聚会

中华内地会历史年表

1860 年代

- 1860 年 7 月 18 日，戴德生从上海启程回英国，11 月 20 日抵达泰晤士河口的贵利夫逊（Gravesend）。
- 1862 年 1 月 8 日，戴德生以“宁波差会”名义招募的传教士宓道生，启程前往中国创立宁波传教站
- 1862 年 7 月，戴德生获得外科医生证书
- 1865 年 6 月 25 日，戴德生将宁波差会改名“中国内地会”
- 1865 年 10 月，戴德生在伦敦出版《China'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
- 1866 年 3 月 12 日，内地会在伦敦出版第一期会刊
- 1866 年 5 月 26 日，以内地会名义的第一批传教士在戴德生的率领下，乘坐“兰茂尔”（Lammermuir）号船，启程前往中国，9 月 30 日抵达上海。
- 1866 年 12 月，“兰茂尔号船传教团”（the Lammermuir Party）抵达杭州清泰门新开弄（新巷）1 号
- 1866 年 浙江 ：杭州 (戴德生建立传教总部)
- 1866 年 浙江 ：奉化 甘比治（George Crombie） 建立传教站。
- 1866 年 浙江 ：绍兴 范明德（John Stevenson (missionary)）和妻子 Ann 建立传教站。
- 1867 年 浙江 ：萧山 倪义来夫妇（Lewis & Eliza Nicol），卫养生（James Williamson (missionary)）建立传教站。
- 1867 年 浙江 ：John Sell 死于天花
- 1867 年 浙江 ：杭州：戴德生的长女 Grace Dyer Taylor 死于脑膜炎
- 1867 年 浙江 ：台州 宓道生（James Joseph Meadows），Josiah Jackson 建立传教站。
- 1867 年 江苏 ：南京 童跟福（George Duncan） 建立传教站。
- 1868 年 江苏 ：扬州 戴德生建立传教站。同年 8 月 22 日，扬州教案
- 1868 年 浙江 ：湖州 麦克悌（John McCarthy ）建立传教站。
- 1869 年 安徽 ：安庆 宓道生，卫养生建立传教站。同年 11 月 3 日发生安庆教案。

- 1869 年 江西 ： 九江 高学海（John Edwin Cardwell）夫妇建立传教站。

1870 年代

- 1870 年 7 月 23 日，"差会的母亲"戴德生师母玛利亚（Maria Jane Dyer）在江苏镇江去世。
- 1871 年 11 月，福珍妮嫁给戴德生。
- 1871 年-1875 年 江西 ： 大姑塘镇（今九江庐山区姑塘镇） 高学海夫妇建立传教站。
- 1874 年 湖北 ： 武昌 戴德生和祝名扬（Charles Henry Judd）建立传教站。
- 1875 年 1 月 《招募 18 个同工》在伦敦出版
- 1875 年 7 月， 《China's Millions》第一期在伦敦出版
- 1875 年 河南 ： 戴亨利（Henry Taylor (missionary)）是该省最早的新教传教士，该省是中国未听见过福音的 9 个省份之一。
- 1875 年 湖南 ： 祝名扬和都夭德（Adam C. Dorward）是该省最早的新教传教士，后来在 1880-1882 年，二人旅行 1500 英里穿越中国
- 1876 年 山西 ： 秀耀春（Francis James (missionary)）和德治安（Joshua J. Turner）是该省最早的新教传教士，开始救济“丁戊年华北大饥荒”的难民
- 1876 年 陕西 ： 鲍康宁（Frederick W. Baller）、金辅仁（George King (missionary)）是该省最早的新教传教士
- 1876 年 甘肃 ： 义世敦（George F. Easton）和巴格道（George Parker (missionary)）是该省最早的新教传教士
- 1876 年 四川 ： 贾美仁（James Cameron (missionary)）是该省最早的新教传教士. George Nicoll 在巡回布道之后定居此处。
- 1877 年 贵州 ： 祝名扬和包兰顿（James F. Broumton）是该省最早的新教巡回传教士。包兰顿 later pioneered 在少数民族苗族和彝族中工作。
- 1877 年 广西 : Edward Fishe 是该省最早的新教传教士，同年去世。
- 1877 年 云南 ： 麦克悌从镇江徒步旅行，经过汉口、四川、贵州和云南到缅甸八莫；履行持续 7 个月，沿途传道。他是最早进入云南的新教传教士。
- 1877 年 西藏 ： 贾美仁从重庆步行到巴塘，第一个传福音给藏人。然后他去了大理和八莫，又经过广东回到重庆，行程遍及当时中国 18 个省份中的 17 个。
- 1878 年山西 ： 福珍尼 Jennie Taylor (Jane Elizabeth Faulding)是最早在中国内地旅行的女性传教士。
- 1879 年陕西: 金辅仁和 Emily Snow King 是第一对迁入汉中的传教士夫妇
- 1879 年 四川 : M. A. Howland Nicoll 是第一名住进重庆的女性传教士

1880 年代

- 1880 年山西: Harold A. Schofield 在太原开办内地会第一所医院。
- 1880 年 甘肃: Elizabeth Wilson (missionary)是该省最早的女传教士
- 1880 年 贵州 : George Clarke (missionary) 和妻子 Fanny 定居该省
- 1881 年 云南 : John Stevenson (missionary)和 Henry Soltau 在 86 天中徒步旅行了 1900 英里，从八莫、昆明、重庆、武昌到上海，从西向东穿越中国。
- 1881 年 云南 : George and Fanny Clarke settle to work in 大理.
- 1881 年 山东 ： 芝罘学校在烟台开办(最初称为 "The Protestant Collegiate School")
- 1885 年 3 月 3 日，“剑桥七杰”抵达中国
- 1887 年，派出“一百名同工”来华
- 1888 年，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创办《National Righteousness》：一份宣传戒毒的期刊
- 1888 年 10 月 30 日，第一批内地会美国传教士抵达中国上海

1890 年代

- 1890 年，戴德生在虹口区吴淞路 9 号正式建立内地会第一个总部大楼，可供 300 多位传教士办公和居住。购屋经费由荣晃熙(Archibald Orr Ewing,1857~1930)捐献。
- 1890 年，第一批澳大利亚传教士抵达
- 1894 年甲午战争，稻惟德在烟台参加红十字救助伤员的工作。
- 1895 年，Newington Green office Headquarters 伦敦

1900 年代

- 在 1900 年的义和团事变中，有 58 名内地会传教士和 21 名他们的孩子被杀害（见义和团教案中内地会殉道者名单）。
- 1901 年，戴德生拒绝接受清政府对财产和生命损失的赔偿，展示‘基督的温柔和良善’
- 1901 年，何斯德（Dixon Edward Hoste）被指定为代理总监督
- 1902 年，杭州崇一堂落成。
- 1902 年 11 月，戴德生辞去内地会总监督
- 1905 年 6 月 3 日，戴德生在湖南长沙去世
- 1906 年，胡进洁（Sir George W. Hunter）进入新疆迪化传教
- 1908 年，慈禧太后去世，内地会向 江苏，安徽和河南派遣洪水和饥荒慰问团队

1910 年代

- 1910 年，J. O. Fraser 抵达中国
- 云南西部部落地区有了 60,000 名基督徒
- 1911 年，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在戒毒运动成功后去世。（第一届世界戒毒大会于 1909 年在上海汇中饭店召开，海班明是大会主席。）
- 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成立。
- 1912 年，内地会传道员超过 1000 人，成为在华最大的传教机构

1920 年代

- 中国内战（Chinese Civil War）和非基督教运动迫使几乎所有传教士都暂时撤退
- 1927 年-1932 年，何斯德发起 200 人专案活动，援助内地宣教运动，从 1200 名申请人中挑选了共计 203 名传教士分三批抵达中国（1929 年 39 人，1930 年 47 人，1931 年 117 人）

1930 年代

- 1930 年，总部迁往上海新闸路 1531 号，有行政管理大楼、传教士公寓、同工宿舍、礼拜堂、招待所。
- 1934 年 10 月 1 日，薄复礼牧师在贵州被迷路的红军抓到，随肖克和贺龙的部队长征达 560 天，经过贵州、四川、湖南、湖北、云南 5 省，行程达一万公里，1936 年 4 月在云南被释放。11 月，他将在红军中的经历出书——《神灵之手》（The Restraining Hand，中文名《红军长征秘闻录》），是西方最早介绍中国红军长征的专著。
- 1934 年 12 月 8 日，200 人专案中的师达能牧师夫妇（John and Betty Stam）在皖南旌德县被红军绑票杀害
- 第二次世界大战迫使许多传教士到更偏僻的内陆 - 或被日本人投入狱中，直到战争结束

1940 年代

- 1942 年 11 月，位于烟台的传教士子弟学校芝罘学校被关闭，所有学生和职员被日军关进集中营。
- 1945 年 8 月，芝罘学校被美国伞兵解救。
-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 年代

- 1951 年， 三自爱国运动，政府控制教会。"三自宣言"发表以后，内地会开始撤退传教士，到 1953 年撤退完毕。所有传教士重新部署在东亚其他地区。
- 1951 年 11 月，在新加坡建立新总部，机构名称也改为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1960 年代

- 1964 年，中国内地会更名为海外基督使团。
- 文化大革命 1966 年-1972 年: 取缔包括三自爱国运动在内的所有基督教活动
- 在泰国农村的医疗工作开始